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
——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

陈仁霞

内容提要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德国不顾国民政府的苦苦挽留,强行撤回已在华存在十年之久的军事顾问,择强弃弱,倒向日本。这不仅是1930年代中德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当时微妙复杂的中德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意义深刻的外交行为,更是二战前夕险象环生的国际大背景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对当时的远东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充分利用德文档案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重现大半个世纪前中德日三国的一场外交角逐,以期为人们研究民国外交史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中德日　三角关系　军事顾问

随着马克斯·鲍尔上校1928年11月率领一个26人的军事顾问团来华,国民政府拉开了聘用德国军事顾问的序幕。① 1928—1938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存在长达10年之久,共有5位德军将领来华担任军事总顾问。② 虽然德国政府曾公开声明并反复强调,德国顾问的身份纯系私人性质,其在华军事活动与德国政府无

① 限于篇幅,本文不作交代,详见马振犊、戚如高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中的有关章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马克斯·鲍尔(Max Bauer)、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关,但如果没有德国政府官方的暗中允诺,这种中德军事合作则无法成立,更谈不上长久。因此可以说,德国军事顾问团是其在华利益的积极代表及其强权政策在远东的延伸点。短短10年间,德国的势力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中国的殖民时代。中德关系因此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必然引起其他列强的极大关注,特别是日本。在微妙的中德日大三角中,德国在华顾问团一直是日本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筹码。关于民国期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这个课题,海内外的史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①,如其产生的背景、运作的过程、重要人物、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等,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依据。但从中德日三角关系的角度对德国在华军事顾问进行历史考察尚无人涉足。本文在运用中、德文史料的基础上,就此展开剖析,以期抛砖引玉。

---

① Bernd Martin (Hrsg.),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Militär-Wirtschaft- Aussenpolitik, Droste Verlag, Düsseldorf 1981; 傅宝真:《德籍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及对军事的贡献》,台北,民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Karl Mehner, 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 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 Dissertation, Leipzig, 1961; 吴首天:《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孙果达:《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兰琴:《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团活动初探》,《晋阳学刊》1989年第4期; John P. Fox, Max Bauer: Chiang Kai- shek's first German military adviser.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5, 1970; Billie K. Walsh, The German military mission in China, 1928—1938,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46, 1974; Bernd Martin, Das deutsche Militär und die Wendung der deutschen Fernostpolitik von China nach Japan, in: Franz Kuipping/Klaus- Jürgen Müller (Hrsg.): Machtbewusstsein i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Paderborn 1984b, 等等。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一　九一八事变: 德日第一次交锋

国民政府聘用德国军事顾问, 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日本的警觉。但是, 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才正式成为中德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砝码: 德国对中、日两国的态度不仅是其远东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而且也是国际局势中的一个敏感变量。日本方面始终认为, 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是一种援华抗战的手段, 所以德国外交部曾一度背离国联对日基本方针, 对日态度暧昧。出于对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德国在对待九一八事变问题上, 名义上坚持"中立", 事实上偏袒日本。① "德国政府在表面上固自谓严守中立, 然实不敢开罪日本。虽对中国不无同情, 惟爱莫能助, 遂……有袒日之嫌"。② 德国在华军事顾问, 是德国制定远东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尽管军事顾问们与德国在华外交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德国官方仍一再否认与德国在华军事顾问之间有任何瓜葛。

至一二八事变后, 日本舆论界开始向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问题开刀。1932 年 2 月 9 日, 日本各大报纸发表文章, 认为中国军队在一二八事变的战役中之所以对日本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 是因为这些参战的中国正规军得到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训练, 因

① 详见陈仁霞著《德国与九一八事变》, 陈谦平主编《中华民国史新论》(下),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徐道邻:《德意志与中日两国之外交关系》, 马振犊主编《中德外交密档 1927—194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4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此指责德国军事顾问间接参加了中国对日作战。[①]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态度也大为转变,甚至威胁要抵制德货。而日军毫无顾忌地轰炸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大学,实际上就是对德国允许军事顾问在华服务这一行为的恶意报复。[②] 其实,日本人对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指责并不成立,因为参加抗战的中国十九路军中并无德国军事顾问,再者,德国总顾问魏采尔[③] 早就对其领导的德国顾问们约法三章,不得参与中国军队的前方作战。[④] 当国民政府决定把按照德国模式训练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调往上海作战时,魏采尔再次向蒋介石表示,鉴于德国的"国法"及德国政府的命令,德国在华军事顾问不得参加前方作战。[⑤] 尽管如此,"军事顾问"问题使德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使德国在国联中的行为不得不重新偏向日本。德国政府曾三次警告各大报纸,严禁发表仇日言论。[⑥]

德国期望通过保持"中立"给自己在中日之间留下一定的回旋

---

① 见德国外交部波恩政治档案馆(Politisches Archiv Auswärtiges Amtes, Bonn, 以下简称 PAAA),秘密档案 1920—1936(Geheimakten 1920—1936),政治四处(Politische Abteilung VI),东亚综合事务(Ostasien Allgemein),中国(China),1932 年 2 月 9 日德国驻日大使伏莱契(Voretzsch)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② 德国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军事档案室(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Freiburg i. Br.),以下简称 BAMF,德国在华顾问,WO 2-44/2,1932 年 2 月 15 日吕特(Rüt)关于上海战役的备忘录,通过德国驻北平公使馆转交德国外交部。

③ 魏采尔(George Wetzell),上将,1930 年 5 月至 1934 年 4 月任蒋介石政府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主要负责协助国民党军队的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曾担任一二八抗战、中原大战和第五次"围剿"的作战顾问。

④ BAMF,德国在华顾问(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WO2-44/2,1932 年 2 月 6 日、2 月 10 日克鲁马赫(Krumach)上尉关于上海战役的备忘录。

⑤ BAMF,德国在华顾问,WO 2-44/2,1932 年 2 月 15 日克鲁马赫上尉关于上海战役的备忘录。

⑥ 《德意志与中日两国之外交关系》,载《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第 41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余地,但并没有得到日本的信任。日本新闻界向德国发动了新一轮攻势,矛头所指仍然是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日本的舆论甚至指责德国作为主要供应商,向国民政府军队特别是向张学良军队提供军用物资。① 对此,德国政府立即发表辟谣声明,并认为在九一八事变问题上德国对日本已经仁至义尽,日方的不领情使其非常失望;日本政府总是借口德国对华军火输出和派遣军事顾问这两个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德国,使德国在处理远东问题上倍感为难;在国联,德国总是因为亲善日本的嫌疑而成为众矢之的。②

1933 年,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德国外交部对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魏采尔曾向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③ 保证过,德国顾问决不参加前线作战,只是做一些相关的后方防御工作。④ 但根据陶德曼提供的情报,顾问海因茨 ⑤ 曾随同孔祥熙视察热河前线,顾问考茨⑥ 和威伯尔⑦ 则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

① PAAA,秘密档案 1920—1936(Geheimakten 1920—1936),政治四处密档(Geheimakten der Abteilung IV),东亚综合事务(Ostasien- Allgemein),1932 年 12 月 9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② PAAA,秘密档案 1920—1936,政治四处密档,东亚综合事务,1932 年 12 月 10 日毕楼(Bülow)致布莱多夫(Bredorf)电报。

③ 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1877—1951),1904 年起任职于德国外交部,1911 年任该部新闻司公使衔参赞,1922 年任神户总领事,1923 年任驻东京大使馆参赞、东亚司五处处长,1928 年任东亚司司长,1931 年任驻北平公使,1936—1938 年任驻南京大使。

④ PAAA,秘密档案 1920—1936,政治四处密档,东亚综合事务,1933 年 2 月 25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电报。

⑤ 海因茨(Erich Heinse),上尉,1929—1934 年任蒋介石政府德国军事顾问。

⑥ 考茨(Richard Kotz),少校,1929—1934 年任蒋介石政府军德国事顾问。

⑦ 威伯尔(Fritz Weber),中尉,1929—1934 年任蒋介石政府军德国事顾问。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① 于是, 德国外交部推断, 魏采尔及其麾下的德国顾问之所以如此毫无顾忌, 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德国国防部的默许, 遂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陶德曼则对日本驻华总领事有吉明宣称, 他虽然与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毫无接触, 但是认为顾问们绝对不会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② 当然, 德国政府之所以在军事顾问问题上没有继续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 是因为国联已经通过《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 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采取了相应措施。决议案虽然没有直接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但要求日本撤兵, 且规定国联成员国不得承认伪满, 日本因此于 1933 年 3 月 27 日宣布正式退出国联。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于是便见风使舵, 没有必要理会日本的责难, 更没有必要继续袒护日本, 于是回归到事变初期的"中立"立场。

1934 年 4 月 17 日、20 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以对记者谈话的方式发表了对华政策的"非正式声明", 即"天羽声明"③, 强调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 反对各国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反对各国对中国借款、出售军火和派遣军事顾问。根据天羽声明, 日本政府把西方列强对中国政府的任何援助, 尤其是军事援助都看作是对远东和平的破坏, 将予以反击。这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独占中国的野心, 同时也不无表明日本对德华军事合作的含沙射影。因为前不久的 1934 年 1 月 24 日, 在德国国防部暗中支持下, 德国大军火商克兰(Hans Klein) 在柏林成立了合步

① PAAA, 秘密档案 1920—1936, 政治四处密档, 东亚综合事务, 1933 年 2 月 24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电报。

② PAAA, 秘密档案 1920—1936, 政治四处密档, 东亚综合事务, 1933 年 2 月 24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电报。

③ 王绳祖等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 世纪中叶——1945)》(修订本), 法律出版社 1992 年, 第 738—740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楼公司①, 进一步拓展以军火贸易为主的大宗德华贸易。同年 8 月 23 日, 中国财长孔祥熙与克兰在牯岭签订了《中国原料和农产品与德国工业和其他产品互换的协议》②, 规定中国用钨矿、锰矿和农产品等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 主要是军需品。但是, 德日之间的战略关系使日本暂时没有抓住出售军火和派遣军事顾问这两个把柄与德国挑明。1933—1935 年, 希特勒当时对中日两个东亚大国实行的仍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所谓"等距离外交"政策。

二　防共协定: 日本提出非分之想

1930 年代中期, 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旧有的外交联合正被打破, 新的国家联合正在建立的除旧布新时期, 德国不愿在这关键时刻坐失良机, 而是赶在其他的力量集团纠集之前, 与具有共同利益的列强 ——日本结成盟友。如果从德国的地理位置稍加考察, 即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 就能发现德国假如既把美英当作对手, 又与苏联为敌, 必难取胜, 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基本相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希特勒遂考虑通过"影子外长"里宾特洛甫设法把日本拉入自己的阵营。

1935 年, 德国继日本之后率先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队伍已扩大到 43 人③, 中德军事、经济合作空前紧密。与此同时, 也积极推进同日本的关系, 希特勒的

① 德文原称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 简称 HAPRO。

② 先在牯岭签订协议书, 后在南京做成正式协定, 简称"中德易货协议", 参见《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 第 324—326 页。

③ 〔德〕汉斯·洛特菲尔斯、弗里茨 T·埃贝施泰因等编:《德国外交政策档案(1918—1945)》, 以下简称 ADAP, D 辑第 1 卷, 巴登—巴登, 开普勒出版社 1962 年, No. 577, 1938 年 4 月 26 日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南京参谋部备忘录。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外交问题特别顾问里宾特洛甫① 与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② 接触频繁, 密商签订德日“防共协定”事宜。德日两国的接近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觉。1935 年 3 月 7 日, 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前往德国外交部探询德日秘密谈判事宜。在此之前, 刘崇杰已经与德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迈尔(Richard Meyer) 就德日秘密谈判的传言交谈过。刘崇杰指出, 这一传言使国民政府深感不安, 同时也影响了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地位和声誉。总是有人告诫蒋介石, 既然德国与中国的敌国日本关系非同寻常, 就不可以雇佣德国军事顾问。③ 虽然国民政府就德日秘密勾结事宜不软不硬地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 但还是对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给予了充分信任。

1936 年的 4 月 8 日, 合步楼公司正式成为德国国营公司。当日, 顾振代表中国政府与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达成协议: 易货协定原文内容毫无变更, 全部由德国政府接受, 附加了补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 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 1 亿马克无限期周转贷款。双方还指定柏林的合步楼公司和南京的中央信托局

①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 1893—1946) , 德国外交家, 1933 年起任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办公室”主任, 1936—1938 年任德国驻伦敦大使, 1938—1945 年任德国外交部长, 是《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1936 年 11 月 25 日) 的德方策划者、谈判代表和签约人。

② 大岛浩, 1921 年出任日本驻德大使馆副武官; 晋升为少校后, 即于 1933 年调任驻奥地利兼匈牙利公使馆武官; 一年半后回国, 先后担任了第八野战重炮团营长、第十野炮重炮团团长、参谋本部处长等职; 1934 年 3 月, 正式出任驻德大使馆武官, 直至 1938 年; 1938—1945 任驻德大使; 1934—1945 年间, 一直为日德军事同盟出谋划策、搜集情报, 是《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日方策划者和谈判代表。

③ ADAP, C 辑(Serei C , 1933—1937) , 第三卷(Bd III) , 哥廷根, 方登许克/ 鲁普莱希特出版社 1973 年版, No. 350, 1935 年 3 月 7 日德迈尔备忘录。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为双方进行易货贸易的官方机构。① 5 月底, 赖希劳② 将军受布隆堡的委托, 在克兰的陪同下前往中国正式批准合步楼合约。7 月 25 日, 中德两国在南京宣布合步楼条约正式生效, 掀起了 1930 年代中德关系的一个新高潮。

1936 年 11 月初, 在一次与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魏茨泽克③ 以及德国外交部埃德曼斯多夫(Otto Erdmannsdorf) 的讨论中, 德国国防经济厅厅长托马斯④ 制订了关于把在华德国顾问转变成军事顾问团的庞大计划, 拟向中国派遣德国现役军官, 并参照德国模式建立中国的"国防经济参谋部"。⑤ 但是, 托马斯的计划被《德日反共产主义协定》(1936 年 11 月 25 日, 亦即"防共协定") 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到 1936 年底, 纳粹政权不仅巩固了其在德国的地位, 而且还为其正在谋求的扩张奠定了基础。重整军备的开始, 四年计划的提出, 莱茵兰的再军事化, 柏林—罗马轴心的形成, 防共协定的签订, 诸如此类的步骤均已既成事实。德国从一个被容忍的平等对手变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大陆军事强国。正如美国学者格哈特•

① 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78—82 页。

② 赖希劳(Walter von Reichenau, 1884—1942) , 1933—1935 年任德国国防军部长司长, 1935—1939 年任第七军区司令员, 1939 年任第十、第六军总司令, 1941 年任南方集团军总司令。

③ 恩斯特• 魏茨泽克男爵(Ernst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 1882—1951) , 1936 年起任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 1938 年起任外交次长, 1943—1945 年任驻凡蒂冈大使。

④ 托马斯(Georg Thomas, 1890—1946) , 将军, 1935 年任德国国防部国防经济厅厅长, 1938—1942 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

⑤ 〔德〕卡尔•梅奈尔:《德国军事顾问作为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表的角色(1928—1936) 》(Karl Mehner, 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ä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n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 , 博士论文, 莱比锡, 1961 年, 第 214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温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德国要发动战争的决心,已成为当时世界外交的中心论题。”①

防共协定的最终签订,意味着德国在一如继往地保持德中关系的同时,也慎重地考虑到了与日本的关系。该协定标志着德日在政治上的结盟,名义上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同盟,实际上是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德国和日本因此结成了一道世界反共产主义阵线,其侵略矛头除指向苏联外,还包括中国、美国和英国。日本企图联合德国和意大利,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除英法美在远东的势力。1937 年和 1941 年相继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这项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

得悉防共协定正式签订后,程天放前往德国政府交涉,询问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② 防共协定附件之一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秘密补充议定书》规定,德日双方应交换情报,如果日本政府根据这一点要求在华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中方军事情报,德国政府将如何处理。布隆堡答称,他相信日本政府不会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万一提出来,德国政府也必然会拒绝,因为所谓“交换情报”只限于有关共产党的活动,绝不包括第三国的国防或其他内政事务。布隆堡还请程天放转告中国政府,他是中国的老朋友,以上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得到程天放的回复后,蒋介石对德国国防部的态度非常满意。③

1937 年初,德国在东亚的地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有利。尽管如此,德国在东亚的外交前景是矛盾的,而不是和谐的。德日缔

① 〔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39)》(上),何江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前言》第 3 页。

② 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1933—1938 年任德国国防部部长。

③ 程天放:《德日防共协定——使德回忆之九》,《传记文学》第 4 卷第 6 期,第 19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结防共协定之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喜不自胜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却忧心忡忡:“我们一直实行的是德日政策和德中政策,而不是德国的东亚政策。我们的东亚政策始终没有统一起来,它总是游移不定,忽而倾向中国,忽而偏向日本,而偏向任一方,都会导致另一方的不满。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寻求与日本的友谊,但同时也在装备日本的劲敌中国。”②

2 月 18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高级代表③ 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就德日防共协定问题举行会谈,称蒋介石本人相信德国政府的承诺,但中国公众的舆论仍然充满反德情绪,并反对继续聘用德国军事顾问。甚至还有传闻称,塞克特④ 将国民政府军队重组建议书交给了日本驻柏林外交代表。对此,国民政府外长王宠惠深信不疑。陶德曼断然否认上述传闻,称德国在华顾问所做的只是忘我地工作;孔祥熙即将前往欧洲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届时可以专程前往德国,向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向希特勒本人了解德中关系究竟如何。⑤ 当时的中国正进行陆军重组,迫切需要德国的支持,蒋介石希望聘用更高级的德国军

① 〔德〕赫伯特•封•狄克逊:《莫斯科,东京,伦敦:关于德国二十年外交政策的回忆和思考》,第 185—188 页。(Herbert von Dirksen, Moskou, Tokio, London, Erinnerungen und Nachdenken über deutsche Aussenpolitik 1919—1939),斯图加特,W. 科尔哈麦出版社,1949 年版。

② PAAA,政治八处(Politische Abteilung VIII),日德政治关系(Politische Beziehungen Japans zu Deutschland),第 1 卷:1937 年 1 月 27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政治报告《东亚的政治关系及德国的东亚政策》。

③ ADAP,C 辑第 5 卷,哥廷根,1977 年版,No. 214,1937 年 2 月 18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档案原文未注明此代表姓名。

④ 塞克特(Hans von Seckt),上将,1920—1926 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1934 年 5 月至 1935 年 3 月任蒋介石政府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主要负责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增强中国陆军的素质与战斗力。

⑤ ADAP,C 辑第 5 卷,No. 214,1937 年 2 月 18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事顾问。所以,只好将德国在华军事顾问会不会向日方出卖中国军事机密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一边。4 月 23 日,法肯豪森[①] 被蒋介石从代理总顾问正式任命为总顾问。陶德曼猜度,蒋介石此举目的是为了把所有在南京服务的德国顾问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正式的顾问团;但法肯豪森不可能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否则将意味着德国在华顾问不仅受雇于国民政府,而且还隶属于德国国防部。作为蒋介石的总顾问,法肯豪森对中国发往德国的订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937 年 4 月,自《德华信用借款合同》于一年前在柏林签署以来,中德易货贸易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两国之间运作。中国的战略原料及农产品与德国的战略物资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络绎不绝地穿梭、对流。但由于德日防共协定的影响,对中德两国都至关重要的中德贸易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一次,宋美龄曾对合步楼条约执行情况表示强烈不满。法肯豪森辩称,中方所说的"物非所订"是因为德方"发错了货";至于价格偏高,则是因为中方在验货时出了差错。在陶德曼看来,法肯豪森升任总顾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因为意大利顾问史帝凡尼(Stefani)对总顾问之职垂涎已久,若不是其影响范围有限,则完全有资格坐上总顾问的宝座。史蒂凡尼也曾参与国民政府的国防经济建设,并缔结了一份类似于合步楼条约的中意贸易协定。陶德曼判断,中国方面不可能吊死在德国这一棵树上,因为中国历来的做法就是以夷制夷。[②]

---

① 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上将,1935 年 3 月至 1938 年 7 月任蒋介石政府第五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主要负责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国民党军队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大量引进德式装备与军事体系,奠定中国现代化军事的基础。

② ADAP,C 辑第 5 卷,No. 349,1937 年 4 月 30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密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三　七七事变: 德日第二次交锋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活动再次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①

虽然德国外交部一开始就努力在东亚政策上保持“绝对中立”②, 中日冲突的加剧, 也给德国带来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德国从自己的欧亚大战略出发, 加紧了同意大利法西斯的联合。7 月 25 日, 牛赖特起草了一份关于意大利加入防共协定的草案呈送希特勒, 以备墨索里尼访德时签署。③ 为了稳住日本政府, 德国驻日使馆在东京进行外交周旋, 谎称德国已经对华实施军火禁运。日方却责备德国直到日方抗议, 才作出对德日关系至关重要的这一决定。德国驻日武官奥托反唇相讥, 称“日本对华北的袭击严重影响了德中经济关系, 德日协定只有在对付苏联时才生效”。④

7 月 27 日, 蒋介石召见陶德曼, 指出七七事变绝不只是一场地方冲突。如果日本继续入侵, 则必定意味着日本试图把整个东亚拖入战争漩涡并断绝中日关系; 至于苏联是否介入有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 目前尚难预料, 但日后必会介入。蒋介石指出:“德国与日本签有把矛头指向苏联的防共协定, 因此中日冲突对德不利; 德日关系异常密切, 因此德国是唯一能与日本和平对话的大

① 关于七七事变初期的中德日三角关系, 详见陈仁霞著《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 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② ADAP, D 辑第 1 卷, No. 463, 1937 年 7 月 20 日麦肯森致德国驻各国外交代表处电报。

③ PAAA: 四处, 德日关系, 1937 年 7 月 25 日牛赖特致魏茨泽克函, 绝密。

④ ADAP, D 辑第 1 卷, No. 469, 1937 年 7 月 27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国。”① 陶德曼却称,德国政府对中日冲突深表遗憾,正在东京方面致力于中日和平;但他怀疑能否“利用微不足道的政治上的防共协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对日本起作用”。② 可见,在远东危机未见分晓之前,德国仍然把“严守中立”作为其在远东的外交行为准则,最充分的理由是,“防共协定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向日本施加影响的任何基础”。③ 所以德国在中日两国政府面前都表明了不打算、也不可能调停的态度。并表明,“我们已经提请日本人注意,不可把防共协定用作其入侵中国的挡箭牌,因为协定中没有关于在第三国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内容。同时,我们再次奉劝日本缓和态度”。④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首次向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托⑤表明日方态度:“德国军事顾问的工作……激化了日本军官团的反德情绪……德日之间的政治合作为日本军方人士所积极推进,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影响了德日之间的政治合作”⑥,因此日本参谋本部“不失友好但绝对严肃地请求德国通过一个友好姿态改善日本军官的反德情绪”。⑦ 奥托表示,德国愿意“满足日本军火计划的愿望,日本军队根本无从抱怨我们不倾力相助”。⑧ 尽管奥托在日本人面前态度

① ADAP,D 辑第 1 卷,No. 470,1937 年 7 月 27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② ADAP,D 辑第 1 卷,No. 470,1937 年 7 月 27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③ ADAP,D 辑第 1 卷,No. 470,1937 年 7 月 27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④ ADAP,D 辑第 1 卷,No. 471,1937 年 7 月 28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电报。

⑤ 奥托(Eugen Otto,1889—1977),少将,1933 年任德国驻东京大使馆武官,1938—1943 年任驻东京大使。

⑥ ADAP,D 辑(1937—1941)第 1 卷,No.469,1937 年 7 月 27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⑦ ADAP,D 辑第 1 卷,No. 469,1937 年 7 月 27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⑧ ADAP,D 辑第 1 卷,No. 469,1937 年 7 月 27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强硬,但考虑到德国毕竟没有真正向中国禁运军火,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① 还是心里发虚。他建议德国外交部"考虑到日军情绪的公开恶化,为了表示友好姿态,至少可以通过德国高层人士与日本驻德大使和武官坦诚地谈一谈德国夹在中日之间的处境"。②

随着德国态度逐渐变得生硬,日本采取了间接攻势,用德语对德进行广播宣传,试图把对华侵略说成是打击共产主义并强迫德国至少在道义上参与。但德国人还是不买日本人的帐。7 月 28 日,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造访德国国防部,希望"军事顾问不参加任何积极的军事行为"。③ 魏茨泽克训示狄克逊说,德国政府早就对在华军事顾问作出相关指示并予重申;有关细节已通报日本大使武者小路公使:"无论事变前还是事变后,德国对华军火输出都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规模小得不值一提","我们向日本人热心展示我们的最新武器,并允许日本考察团到处参观。日本人迟迟不下订单,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德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与德日贸易并不矛盾。现在中日战争状态临近之时,由于持中立态度,我们仍将继续向中国输送战争器材。在目前的情况下召回德国顾问将意味着与南京政府为敌,因此是不可能的。一旦顾问被召回,他们就可能被苏联人取代,此种后果亦非日本所愿。"④ 德国人的大实话令日本人哑口无言。武者小路公使最后希望德国国防部禁止德国在华顾问参加对日实战。关于这一点,德国国防部已经向在华顾问两度下达了相关指示。

---

① 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 1882—1955),1925—1928 年任德国外交部东亚司司长,1928—1933 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33—1938 年任驻东京大使,1938—1939 年任驻伦敦大使。

② ADAP, D 辑第 1 卷, No. 469, 1937 年 7 月 27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③ ADAP, D 辑第 1 卷, No. 472, 1937 年 7 月 28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日大使馆电报。

④ ADAP, D 辑第 1 卷, No. 472, 1937 年 7 月 28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日大使馆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日本侵略军把战火燃到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时, 中日双方都打算战而后和。日本企图速战速决, 在击败中国军队后, 强迫对方订立城下之盟; 国民政府则希望能持久抵抗, 以待时变, 争取有利条件结束冲突、以战谋和。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有力还击, 而参加淞沪抗战的军队中有一些是由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

日本军队在淞沪战役中的暂时失利, 再次导致日本人对德国在华顾问的不满情绪。几天后, 狄克逊向德国外交部汇报, 有消息表明, 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了淞沪战役。① 一名美国记者发表文章, 称"五名德国将军和 100 名德国军官积极参加了中国抗日的幕后指挥"。② 狄克逊认为, 虽然日方为了稳定日本民心也在努力封锁这一消息, 德国政府仍然有必要通过海通社正式辟谣。③ 鉴于此, 陶德曼大使再次向德国在华顾问强调, 他们在华职责范围一如既往; 与国民政府的合同即将期满者, 将不予考虑续签。④

在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停战的同时, 国民政府寄希望于英美等大国出面调停, 可惜皆成泡影。8 月 21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诺夫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无论对日本还对德国来说, 该条约都不啻一个政治打击。德国才不得不正视与中日两国关系的尴尬处境: 在经济盟友中国和政治盟友日本之间取舍两难。

---

① ADAP, D 辑第 1 卷, No. 483, 1937 年 8 月 23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② 关于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因为当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总数仅 30 名。

③ PAAA, 政治八处(Politische Abteilung VIII), 东亚/中国(Ostasien China), Po. 13, 在华军事事务(Militärangelegenheiten in China), 1937 年 9 月 6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④ PAAA, 政治八处, 东亚/中国, 在华军事事务, Po. 13, 在华军事事务, 1937 年 9 月 7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8 月 23 日,狄克逊再次致电德国外交部,要求德国政府适时调整远东政策。其主要理由是:

一,随着军事形势的进展和战场的扩大,德国很难继续保持中立。随着战火向华北蔓延,德国顾问无法不被牵涉。随着战争升级和损失加剧,日本会越来越相信外国捏造的关于德国顾问直接参与淞沪战役的传闻,进而寻找替罪羊。日本将会认为,德国的中立立场对日不利。

二,为避免德日冲突,德国政府最安全的做法是召回在南京的顾问。而一旦采取这一步骤,势必牵扯到德中关系。我与武官奥托一致建议,通过严格的条文约束德国军事顾问的在华活动,同时采取适当措施安慰日本。

三,在难以继续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德国可考虑调停。前提是,中国必须首先向日本作出让步。德国在华顾问有两个重要任务,其一是劝告蒋介石停战以免血染全中国,其二是联络调停行动。①

9 月 9 日,与德国国防部磋商之后,德国外交部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德国没有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派遣过军事顾问团,只是某些国家聘用了少数私人军事顾问。但是,这样一个声明并没有使日本感到满意。②

四　调停失败:德国东亚政策转轨

中日战争初期,尽管日本再三抗议,德国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

① ADAP,D 辑第 1 卷,No. 483,1937 年 8 月 23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绝密电报。

② PAAA,政治八处,东亚/中国在华军事事务,第 1 卷,1937 年 9 月 9 日,德国海通社消息。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利益的需要援助国民政府,仍一如既往地向中国出售军火、在华德国军事顾问也无任何撤离的迹象,这再次引起日方的强烈不满,并一度造成德日关系的紧张状态。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德国政府虽然很快开始了一些在日方看来"不痛不痒"的措施,如在1937年10月下令在华军事顾问不得参与军事活动,并宣布停止对华输送军火①,从而使德日关系有所缓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德国摆脱在远东的困境。再者,"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正逐渐增加,德国被迫面临选择:是对中国袖手旁观,还是消除两国的敌对状态。令人尴尬的是,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指挥为中国服务的苏联战斗机飞行员对日作战"。② 因此,德国幻想通过调停③ 这一招一方面确保德国在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方面防止德日关系因为德国的对华政策而趋于恶化。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德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居间斡旋,开展了著名的调停活动,力促中日两国言和。德国调停中日争端的首要动机是为它的东亚政策困境寻找出路——把德中经济关系与德日政治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德国的调停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正如狄克逊所分析的那样:"德国调停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在华军事顾问问题。日本迫切希望德国政府将其召回,但德国会因此失去中国政府的信赖,顾问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德国调停的失败。既然调停已不复存在,德国政府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在意国民政府对召回顾问的反应。""日本当初之所以请求德国出面调停,是因为身处逆境,迫不得已地让德国充当和事佬。日本

① ADAP, D辑第1卷, No. 499, 1937年10月19日麦肯森备忘录; No. 500, 1937年10月19日海顿—瑞恩施(Heyden- Rynsch)备忘录。

② ADAP, D辑第1卷, No. 530, 1937年12月3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Nr. 386)。

③ 详见陈仁霞《陶德曼调停新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的境况现已扭转,秋后算账应在德国预料之中。德国政府应未雨绸缪,重新考虑军事顾问和军火输出这两个棘手问题,并主动向日本政府解释。否则,其他列强,特别是英国将先下手为强。调停一事表明德国在远东事务中的影响逐渐升级,从而使其他列强颇感不快,他们必然会抓住德日关系中的这两个敏感点进行挑拨离间。”①狄克逊要求德国政府召回在华服务的军事顾问:

> 如果让德国在华军事顾问保持现状,势必受到两面夹攻,有损德国的声誉:中国可能会指责德国顾问向日本出卖中国的作战计划,日本在华前线部队则猜疑德国顾问制定了中国的作战计划并领导中国军队抗战。在中日正面交锋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长此以往,其他列强也会归咎于德国顾问。随着日本军队的步步紧逼,法肯豪森及其手下的顾问们也不得不随中国人一起从苏州辗转到南京,到汉口,到重庆。这给德国军人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德国顾问最终也不得不分担中国被打败的责任;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恰恰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德国政府对德国在华军事顾问被苏联人取代的担心是杞人忧天。长期以来,中苏军事合作并不紧密,主要原因不是中方保守,而是苏方低调。孙科前往莫斯科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但毫无结果。苏方仅仅提供物质援助,包括向中国输送飞机和飞行员,以恢复中国空中作战的能力。②

德国调停失败之后,日本政府一直在等待时机,企图抓住德国在华顾问这个把柄在中德日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1938 年 2 月

① ADAP,D 辑第 1 卷,No. 564,1938 年 1 月 26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政治报告。
② ADAP,D 辑第 1 卷,No. 564,1938 年 1 月 26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政治报告。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初, 机会终于来了。希特勒改组内阁, 对华友好的外长牛赖特、[①] 经济部长沙赫特[②] 和国防部长布隆堡相继去职, 德国政府中所谓的"中国院外集团"不复存在。德国新外长里宾特洛甫上任的第二天, 日本外务次官堀内谦介就向狄克逊指出: 为了进一步巩固德日关系, 必须结束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一切行为。[③] 纳粹势力在德国政府的膨胀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咄咄逼人之势, 昭示着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势在必然。

1938 年初的时候, 德国这个有可能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采取了重大步骤, 终于向日本靠拢, 以阻止日本与美英苏合作。2 月 20 日, 希特勒在第三帝国议会上公开宣布承认伪满, 这是继陶德曼调停之后德国远东政策从中国转向日本的一个重要标志。于是, 横亘在中德日外交大三角中的德国在华顾问问题, 紧接着列上了里宾特洛甫的东亚外交政策的日程。不过, 德国在召回顾问之前首先做了一项铺垫工作——遣散中国留德军事学员。3 月 3 日, 根据希特勒 2 月 25 日关于中、日在德军事学员事宜所作的相关指示, 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魏茨泽克约见中国大使馆参赞谭伯羽称, 为了保持中立, 德国政府决定在中日战事停止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进入各军事学校; 已经在德的学员, 则必须设法尽快结束学业; 德国海军方面也奉命通知原定随同德国军舰前往南美实习的中国海军学员成行。他还奉里宾特洛甫之命通知中方, 在

---

① 牛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 1873—1956), 1930—1932 年任德国驻英大使, 1932 年 6 月至 1938 年 2 月任德国外长, 经历了巴本、布吕宁和希特勒三任内阁。

② 沙赫特(Hijalmar Schacht, 1877—1970), 魏玛共和国及纳粹德国的金融专家, 1923—1930 年、1933—1939 年两度担任帝国银行总裁, 1934—1937 年兼任德国经济部长, 1935—1937 年任国防经济全权总代表, 1937—1943 年任不管部长。

③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65, 1938 年 2 月 5 日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处理中日两国军事学员问题上,“德国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措施”。这其实是德方对中方的一种安慰,中方却信以为真,并追问德国政府,在华军事顾问问题是不是暂缓处理?魏茨泽克实话实说,顾问问题免谈。① 事实上,至于在德进修的日本军事学员,希特勒的指示却是暂缓处理。②

3 月 23 日至 4 月 7 日,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展开了半个月的血战,予敌重创,取得了徐州会战第一期作战中的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全国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认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正是因为中国军队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日本再次向德国在华顾问发起攻击。

4 月 12 日,狄克逊从东京返回柏林,准备就任德国驻英大使之职。正是他这次在柏林的逗留促使希特勒做出了召回顾问的决定。他向希特勒汇报说,德国军事顾问若继续在华逗留,势必妨害德日关系;新任大使奥托和他本人一致认为,由于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原因,德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于是,希特勒就顺水推舟地委托狄克逊说服里宾特洛甫,尽快采取措施召回在华顾问。当天,里宾特洛甫用一封粗鲁的电报实现了希特勒的愿望。③ 于是,希特勒政府终于把德国远东政策从对华友好调整为对日亲善,想以召回顾问之举,再次向日本强调德国的态度,并以此在暗中向英国

① PAAA,政治二处密档,东亚,第 1 卷,1938 年 3 月 3 日魏茨泽克备忘录。

② PAAA,政治二处密档,东亚,第 1 卷,1938 年 2 月 26 日希特勒的德国国防军副官 Schmundt 致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函。

③ 〔德〕赫伯特·封·狄克逊:《莫斯科,东京,伦敦: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回忆与思考 1919—1939》第 209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施加压力,以免其在德国日后进攻捷克和苏台德地区之时设置障碍。① 正如里宾特洛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言,德国在对华外交上的这一举动,为的是密切配合德意日同盟计划。②

4月22日,陶德曼接到德国政府指示,德国顾问必须中止在华工作,立即返德。③ 德国政府的这一措施没有知照中方,但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还是通过英国、法国和捷克的传媒获知这一消息。关于德国拟召回在华军事顾问一事,上述几个国家的报纸早已沸沸扬扬。27日,程天放前往德国外交部造访由政治司司长升任外交次长的魏茨泽克,对上述传言进行核实。后者表示,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德国在中日冲突间保持中立的需要;如果继续让30名左右的德国退役军官在国民政府效力,则会使世界舆论认为德国在积极地影响中国的战争指挥;德国不会向其在华军事顾问下达任何军事命令,因为他们都不是现役军官;德国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所以不希望有军事顾问留任中国;尽管这些顾问的在华活动纯系私人行为,但毕竟与德国政府的政策相左。④

德国政府召回顾问的想法首先在法肯豪森总顾问那里遇到了麻烦,后者向德国外交部陈述了顾问们应召回国的种种困难:

> 1. 所有顾问都在汉口,且都退居二线在军校任教官;严禁任何顾问在前线逗留。

---

① 〔德〕沃尔夫冈·米夏尔卡:《里宾特洛甫与德国的世界政策1933—1940:第三帝国的外交方案和抉择过程》(Wolfgang Michalka, Ribbentrop und die deutsche Weltpolitik 19933—1940. Aussenpolitische Konzeption und Entstehungsprozeβ im Dritten Reich),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② 《里宾特洛甫与德国的世界政策(1933—1940):第三帝国的外交方案和抉择过程》,第222页。

③ ADAP,D辑第1卷,No.580,1938年4月30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④ ADAP,D辑第1卷,No.578,1938年4月27日魏茨泽克备忘录;程天放:《柏林最后五个月——使德回忆之十八》,载《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第29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2. 德国顾问都与中国政府签订了私人雇佣合同, 有效期至 1939—1940 年, 不可能单方面解除。单方面解约意味着中止合同, 将会导致法律上的损失赔偿义务以及过渡损失; 同时还存在回国旅费、面临失业等问题。

3. 对多数顾问来说, 单方面解约意味着放弃终身职业和经济破产, 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可能在德国找到相应的职位, 特别是那些拒绝过或不可能再次被德国国防军雇佣的人。

由于战争引起的超支, 部分顾问必须承担经济义务, 一旦违反约定解除合同, 他们将在中国背负债务, 连路费都没有。

4. 几乎所有顾问的房产和大部分家产都在南京, 因此必须继续在那里服务, 否则其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遭到日本人破坏。由于不可能运回, (顾问们) 离开中国就意味着, 他们将失去大部分财产。

5. 顾问组织中的女秘书们都是自费来华, 无法回家, 无望找到其他工作。

6. 因此德国政府必须承担顾问们及其家属和女秘书们的回国旅费、住房安排等事宜, 以及顾问们因解约而产生的其他损失。必须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解约事宜), 因为顾问们本身没有任何理由。

7. 由于迄今为止都没有提及解除合同的问题, 冲突之初乃至元首 2 月 20 日发表演说之后, 蒋介石问起的时候, 我都承诺说, 我本人将信守合同。

8. (有关情况) 尚未通知其他顾问乃至将军们, 以免引起 (他们) 对未来的不安。①

鉴于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存在着很多技术上的难度, 一时难以

①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80, 1938 年 4 月 30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贯彻,德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索性双管齐下。5 月 3 日,德国政府下令对华实施军火禁运,旨在釜底抽薪。[①] 里宾特洛甫对付中国的两招杀手锏,终于博得了日本政府的青睐。5 日,狄克逊向广田外相辞行时,后者表示,“日本政府非常赞赏德国政府最近关于从中国撤回军事顾问的决定”。[②]

与军事顾问问题一样,对华军火输出问题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德日关系的一块伤口,日本却偏要往伤口上撒盐。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随即在一次与德国外长牛赖特的谈话中提出日本政府的要求:德国应立即中止对华输出军火。牛赖特称,德国对中国的军火运输保持在“克制的框架内”,纯粹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商业行为,决不会影响到德日关系。矢内却说,牛赖特曾向武者小路“自觉自愿”地声明,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并在 7 月 15 日重申了这一承诺;但仍有消息表明,大批军用物资正运往上海,七艘货轮已经起航,尚有三艘即将出发。他还威胁,日本政府将会没收继续运往中国的军火。[③]

5 月 9 日,蒋介石约见陶德曼,首先谈到德国对华军火输出问题。他说他从中国驻德大使处得到消息,柏林方面有意对华实施军火禁运,令他颇感费解;尽管意大利对华态度非常不友好,但对预定的货物仍照单供货,而且刚向中国输送了 19 辆(架)坦克和飞机;中德贸易由来已久,如果德国现在停止向中国供货,将会使中国非常失望;尽管德国承认伪满,中国政府仍隐忍以行,继续维持对德友好关系,如果德国在其他列强照常向中国供货的情况下,突

① 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九),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 1996 年版,第 4086 页。

② ADAP,D 辑第 1 卷,No. 581,1938 年 5 月 5 日狄克逊备忘录。

③ ADAP,D 辑第 1 卷,No. 472,1937 年 7 月 28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日大使馆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然撕毁合同,将会深深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倘若两国关系继续存在,中国将保持与德国在经济及其他领域的紧密关系——他希望这也符合德国的愿望,并期望两国开始进一步的交涉。蒋介石要求陶德曼把他的意见尽快转达德国政府。从蒋介石的态度看来,中德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德国突然提出召回顾问和军火禁运问题,德国自中日冲突发生以来在中国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有可能会前功尽弃。①

5 月 3 日至 10 日,希特勒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时谈到缔结德意军事同盟的计划,但未获成功。于是希特勒决定加强德意日三国合作,以共同对付英法两国。他迫不及待地从罗马电令德国国防部,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返回柏林后,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至少要让日本旗帜鲜明地站到德国一边。里宾特洛甫不同意逐步召回顾问,而是主张不顾中国的反应立刻全部召回。②

需要说明的是,在"军火禁运"这个问题上,德国政府并没有满足日本方面的愿望,因为一旦德国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停止向中国提供根据合步楼条约规定的 2.82 亿帝国马克军火,对德国军火工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巨大损失,而且关系到其生死存亡③;同时,中国必将采取相应措施停止向德国供应其急需的钨矿等战略原料,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华商将会抵制德货。④ 因此,尽管德国官方宣布了对华实施军火禁运政策,但德国的武器、兵工生产机具仍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后再转运中国交货。运载着中国的钨

① ADAP,D 辑第 1 卷,No.582,1938 年 5 月 9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② 〔德〕保尔·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跑龙套者》(Paul Schmied,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 1923—45),波恩,考赫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94 页。

③ ADAP,D 辑第 1 卷,No.594,1938 年 6 月 16 日维尔备忘录之附件。

④ PAAA,政治三处,中国与日本,施密登备忘录。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矿等战略物资和大豆等农产品的货轮也穿梭在大西洋上。直到1939—1940年,中德关系仍藕断丝连。

五　中德关于顾问去留的交涉

为了向日本妥协,里宾特洛甫毫不犹豫地付出了牺牲中德关系的代价。5月13日,他在一份电报中训令陶德曼通知法肯豪森,德国政府希望尽快召回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应立即通知其他顾问,并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鉴于陶德曼在4月30日电报中所提到的德国顾问单方面解除合同的困难,里宾特洛甫训示陶德曼协助顾问们劝说中国政府允许他们提前中止合同:中日冲突已具备战争性质,若德国顾问继续留在中国,则违背德国的中立态度,且世界舆论也将指责德国援华抗日;希望中国政府"鉴于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满足德国政府的愿望;德国现在之所以提出召回顾问,是因为已经对中国的形势作了充分认识。里宾特洛甫向陶德曼和法肯豪森承诺,德国政府将承担顾问们的返程旅费并补偿部分损失。①

5月15日,陶德曼与新任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在香港就撤回顾问问题举行会谈,一致认为最理想的做法是分期分批地逐步撤回,并将此共识致电德国外交部,② 但被里宾特洛甫断然拒绝。17日,里宾特洛甫在致陶德曼的电令中宣称:这是希特勒的口谕,有关德国顾问必须立即返回,强行与中国政府解除雇佣合同。他还

① ADAP, D 辑第1卷, No. 583, 1938年5月13日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

② ADAP, D 辑第1卷, No. 584, 1938年5月13日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脚注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指示陶德曼,“如果中国政府在解除合同时给您制造麻烦, 您可以暗示您将会失去驻华大使之职”; 并让他立即向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摊牌: 任何对帝国政府命令的违抗, 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①

此时退守武汉近半年的国民政府内外交困, 祸不单行: 一方面日本在军事上蚕食鲸吞, 另一方面德国在外交上攻势逼人, 逼得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喘息之机。在武汉大规模激战即将爆发的节骨眼上, 倘若德国顾问突然撤出, 不但意味着战场指挥、协调上的损失, 而且给国民党军队士气以重创。希特勒这一场背信弃义、釜底抽薪的外交袭击, 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国民党军队对德国太过倚重了。蒋介石自 1927 年与苏联断交后, 就把目光瞄准了德国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崛起的西欧军事强国。十余年间, 他不仅从德国得到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军援物资, 还直接引进了德国的军事人才和战争思想。1935 年, 德国在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有 43 人, 1937 年 30 人, 1938 年 24 人。② 这些德国人对蒋介石稳定江山作用巨大。平定军阀, 统一天下, 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功劳;“围剿”苏区, 疯狂反共, 蒋介石更是用尽了德国顾问的军事主张; 中国的国防设施, 也大都是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建设的。七七事变之初, 德国并不想得罪中国, 武器照样卖, 军事物资照样输送, 只要能从中国换取德国紧缺的军事和战略原料。但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 德国必然要在远东两强中做出抉择。

5 月 20 日至 21 日发生的捷克危机促使德国加快了召回在华

①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84, 1938 年 5 月 13 日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

②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77, 1938 年 4 月 26 日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南京参谋部备忘录。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军事顾问的步伐。①

5月 21 日,德国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于中国的德籍顾问一律返国,理由仍然是为了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② 当天,陶德曼奉命拜访中国外长王宠惠,请他把德国政府要求召回顾问的决定转告蒋介石(当时蒋不在汉口)。德国政府的决定使王宠惠大感意外。对中国来说,德国承认伪满已经是一次巨大的伤害,但鉴于德国政府在此后的照会中表达了维持中德关系的愿望,中国政府才竭力压制中国民众的反德情绪。一旦德国召回顾问,将会被中国人看作是德国对日本的间接支持。王宠惠指出,中日两国一直还没有正式宣战,德国政府没有必要采取中立原则;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事顾问一样,德国的军事顾问纯粹是以私人的身份在中国政府工作,因此对各自的政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义务。王宠惠绵里藏针地说,德国的做法将会使中国人民失望,从而迫使中国倒向苏联一边。③

1938 年 2 月至 5 月短短的三个月内,德国政府连续采取了承认伪满、停止接收中国军事学员、签订《德满修好条约》、对华禁运军火和召回顾问等一系列旨在弃华联日的重大外交举措,尤其是召回顾问这一步骤更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大失所望。上海《大公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德国政府召回顾问团》,指责德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支持日本的非正义行径。

> 中立是好的,但可惜承认伪国后的中立论,其说不圆。大概德国此举,是出于日本之催促,日本自去夏攻华以来,就以

① 程天放:《柏林最后五个月——使德回忆之十八》,载《传记文学》第 7 卷第 6 期,第 29 页。

②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九),第 4086 页。

③ ADAP,D 辑第 1 卷,No. 585,1938 年 5 月 21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此事运动德国,最近又有要求,德国看日本很重,所以有此步骤。我们所特别注意者,中国抗战已十个月,德国过去,一方虽于外交上便利日本,但对中国之传统关系,还有若干希望保持的迹象。自今年三月后,又步步变化,是不是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国社党竟误认大中国从此一蹶不振,所以要加紧地买日本欢心?那么,德国今后在远东的动态,我们却不能不由另一种意义加以特别注视了。①

面对里宾特洛甫上任后接二连三的外交袭击,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愤而屡次请辞。5 月 30 日,国民政府接受了程天放的辞呈,由外交次长陈介继任。②

陶德曼曾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会谈中坦言:"我们的对华关系已经走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若眼下在顾问问题和提供军火问题上采取突然行动……我们在中国的所有建设性努力都将化为乌有。"③ 陶德曼在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也指出,他关于军事顾问的观点确实与德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合拍:"一方面意味着偏向中国,另一方面,如果突然召回所有的顾问,则意味着选择日本。"④ 他建议,作为一种折中的做法,应该是逐渐减少顾问的数量。

中德之间关于德国军事顾问的去留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

① 1938 年 5 月 26 日《大公报》,转引自《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九),第 4088—4090 页。

② 程天放:《柏林最后五个月——使德回忆之十八》,第 32 页。

③ 〔德〕泰奥·左默:《列强之间的德国与日本(1935—1940),从反共产国际协定到三国协定,二战前外交研究》Theo Sommer, 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ächten 1935—1940,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Dreimächtepakt: eine Studien zur diplomatischen Geschichte des 2. Weltkriegs),蒂宾根,默尔出版社,1962 年版,第 112 页。

④ 《列强之间的德国与日本(1935—1940)》,第 112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德国方面一直在等待消息, 但中国方面毫无反应。5 月 31 日, 魏茨泽克再次致电陶德曼, 敦促中国政府特别是蒋介石本人满足德方愿望, 解聘军事顾问, 并确定顾问们的归程。① 蒋介石的托词却是, 他还没有机会与顾问们面谈此事。②

见中国方面仍不予答复, 德国外交部又气又恨, 却又无可奈何。6 月 7 日, 魏茨泽克造访程天放(新任大使陈介尚未到任), 要求中国驻德大使馆转达蒋介石: 德国政府希望顾问问题尽早解决, 以免两国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纠纷。次日, 陶德曼再次接到命令, 必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中国政府解聘德国顾问。③

尽管德国外交部再三施压, 中国政府仍保持沉默, 置若罔闻。于是, 德国方面认为有必要给中国政府规定一个最后答复期限。6 月 10 日, 魏茨泽克致电陶德曼: "最迟到星期一(6 月) 13 日, 我们等待着您关于军事顾问启程日期的最后答复。" ④ 同日, 法肯豪森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 要求解聘所有德国顾问。蒋介石请求法肯豪森及另外 4 名顾问必须继续留在中国待一段时期。法肯豪森未置可否, 但在此后与德国顾问的谈话中表示, 他们不可以拿自己冒险。⑤ 12 日, 陶德曼再次通过国民政府要员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这位要员反问, 这是不是德国的最后通牒? 陶德曼回答, 最迟必须

① PAAA, 国务秘书办公室档案(Büro des Staatssekretärs: Chinesisch – japanischer Krieg), 中日战争(Chinesisch – japanischer Krieg), 第 3 卷, 1938 年 5 月 31 日魏茨泽克致陶德曼电报。

② PAAA, 国务秘书办公室档案, 东亚冲突(Ostasienkonflikt), 1938 年 6 月 4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③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1, 1938 年 6 月 10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华(汉口) 大使电报, 注 1。

④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1, 1938 年 6 月 10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华(汉口) 大使电报。

⑤ PAAA, 国务秘书办公室, 东亚冲突, 1938 年 6 月 11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于 6 月 13 日给出答复。①

6 月 13 日, 里宾特洛甫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他亲自致电陶德曼: 顾问们继续拖延启程, 绝对不符合国家秩序; 希特勒本人期待着顾问们立刻出发; 倘若法肯豪森或个别顾问制造麻烦, 德国政府将对有关人等采取“能够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 不予考虑法肯豪森关于担任大使馆武官的申请; 如果蒋介石继续阻挠解聘军事顾问事宜, 请转告他, 德国将立即召回驻华大使。② 14 日, 陶德曼回电德国外交部, 蒋介石对德国政府的愿望表示理解, 中止与所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合同, 其中的大部分将立即出发, 但仍请求几位顾问能在解除军事职能之后逗留一段时间, 移交德国军事顾问们手中的有关事务。陶德曼把里宾特洛甫的严厉警告也转达了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坚持挽留几位顾问办理交接手续。③

6 月 15 日, 法肯豪森向德国 OKW 报回了一份将奉命离华返国的顾问的名单。名单上共 25 个人, 但不包括法肯豪森本人。④

19 日, 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陈介再次转告陶德曼, 他将坚持自己的最后一点要求, 挽留五六名德国顾问做好善后工作。陶德曼则请陈介转告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执意如此, 陶德曼将会被立即召回。陶德曼向德国外交部汇报说, 中国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应对“召回顾问”这个争议问题。⑤

---

①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1, 1938 年 6 月 10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 注 2; 至于文中所提“要员”, 原文档案不详。

②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2, 1938 年 6 月 13 日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

③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3, 1938 年 6 月 14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④ BAMF, 德国在华军事顾问, Msg. 160/9, 1938 年 6 月 15 日法肯豪森致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OKW) 电报。

⑤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6, 1938 年 6 月 19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蒋介石软硬不吃,使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6 月 20 日,他向陶德曼下了一道几乎是最后通牒的指示:“到本周四亦即 6 月 23 日,倘若中国政府还不表示最终同意所有德国顾问返国,我请您立即把事务移交使馆代办,离华返德。请您收及本电后立即通知中国政府,告诉他们,顾问问题的继续延宕,势必涉及(德中)外交关系是否有可能或有必要保持,或者被我们中断。根据您的情报,我发现,在可能的情况下不久就会中断关系。”① 里宾特洛甫训示陶德曼,把希特勒的指示立即通知所有的军事顾问,请他们毫不犹豫地辞职,并尽快离开中国,即使违背国民政府的意愿。他还要求法肯豪森陪同陶德曼一起把德国政府这一强硬命令转达国民政府,以向中方表明德国军事顾问们去意已决。

6月 21 日,陶德曼把里宾特洛甫的命令抄送总顾问法肯豪森:“本部长急待留华全体德籍军事顾问,凡职务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并尽速离华,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旨意,亦在所勿恤。由现居住地起程及离开华境日期,请电达柏林。顾问中倘有起程遇有障碍,著即向就近德国官署汇报详情。顾问中若有……不遵领袖(指希特勒——引者注)训令办理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② 当天晚上,陶德曼还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与法肯豪森一起向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徐谟转达了德国方面的最后通牒:“如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全体德国顾问之及时离华不予明白表示同意,并担保该顾问等之离华,则本大使奉命立即将所有职务移交于代办,离华

①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7, 1938 年 6月 20 日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

② 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九),台湾渤海堂文化公司 1996 年版,第 4107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返国……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予以断绝, 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①

6月 23 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代表终于把中国政府关于对德国召回军事顾问问题的答复交给了陶德曼。中国政府首先表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国民政府与军事顾问之间的雇佣合同问题) , 但为保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后来还是放弃了。

> 中方尽量满足德国政府的愿望, 解除所有德国顾问的合同, 允许他们离开中国, 因为中国不希望德国公民背叛自己的政府。但中国政府坚持认为, 五六 个顾问暂时留下来, 交接他们的事务。
>
> 中国政府以为德国政府会欣赏中国政府放弃法律立场、中止与德国军事顾问雇佣合同之做法, 未料德国仍不满意, 坚持要求所有军事顾问立即离华, 且要求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离境提供保证, 甚至威胁说, 否则将采取不友好的外交措施。中国政府无法理解德国如此态度是出于何种法律或感情原因, 深表遗憾。任何把中国当作真正朋友的国家, 也将在中国被当作真正的朋友对待。鉴于中德两国以前的特殊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满足了德国政府的愿望, 因而也希望德国政府考虑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并采取同样的态度。②

陶德曼对孔祥熙说, 夹在中德两国之间的纯粹是一个“面子问题”, “即使五个军事顾问留下来, 他们也为中国做不了什么事情……外交上永远不可能就纯粹的声誉问题进行交涉”。③ 孔祥熙的解释是, 被挽留的几个顾问了解如何对汉口和长江流域布防。

---

①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九) , 第 4107 页。

②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9, 1938 年 6 月 23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③ ADAP, D 辑第 1 卷, No. 599, 1938 年 6 月 23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当天,行政院长孔祥熙为德国顾问举行了告别宴会,并发表讲话向德国顾问们表示感谢。陶德曼在致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表示:“很遗憾,我没能成功。但我认为在一个国家强敌压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表现得宽容一些。”①

然而,里宾特洛甫实行的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对华政策,不想向危难中的中国表示丝毫的宽容。6月24日,他在致陶德曼的答复中拒绝了中方陈述的理由,称事关“德国顾问的声誉”。他毫不理会国民政府的不满,反而认为规定的期限已到,中国政府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勒令陶德曼立即返回,允其转道香港探视在港治病的大使夫人,但不可因其转道香港而使中国政府产生任何幻想,否则将被视同违抗德国政府命令。里宾特洛甫否决了法肯豪森关于以德国驻华武官的身份留在中国的请求,训令陶德曼将在华顾问的返德事宜交由德国驻华使馆代办全权代理。②

同日,总顾问法肯豪森写了一封致全体顾问和教练的告别信。信的字里行间不无流露出一个德意志旧式军官对德国政府作出撤回在华军事顾问这一决定的毫不掩饰的批评:

> 不得不应聘在中国国民政府工作10年之后,德国顾问团不得不停止活动。这期间,130余名德国男人为发展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最大努力,并坚信这样做同时也能为祖国德意志作出最大的贡献……回首我们的工作和成绩,我们倍感自豪和欣慰。解聘我们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波及到我们的

① ADAP,D辑第1卷,No. 599,1938年6月23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② ADAP,D辑第1卷,No.600,1938年6月24日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政治原因。尽管如此,我们受到了中国各个方面,特别是中国伟大的元首蒋介石元帅的最高认同和感谢,只是迫于外交关系的压力中断,这是对我们的工作、恪尽职守直至最后一刻的最高奖赏。①

25 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称,已决定解除与德国军事顾问的雇佣合同,允其悉数回国,以满足德国政府的愿望;但他不想让这些在中国工作了十年之久的军事顾问们在中国尚未答谢之时就离开,想邀请顾问们到他们还没有去过的四川、云南等一些省份参观之后再回国;一周后,最迟两周,他将做好让顾问们离华返德的一切准备。蒋介石还询问陶德曼,是否有可能继续留驻中国。②

对中方的苦苦哀求,德国政府置若罔闻。6 月 26 日,里宾特洛甫回电陶德曼称,根本不予考虑蒋介石的建议。中德两国的关系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立即无条件地对全体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放行。③ 当天,陶德曼从汉口飞往香港看望其在港治病的妻子,逗留了几天。④

眼看中德关系大势将去,蒋介石最终不得不对德国军事顾问

① BAMF,德国在华军事顾问,Msg. 160/9,1938 年 6 月 24 日法肯豪森《致全体顾问和教练书》。

② PAAA,国务秘书办公室,中日战争第 3 卷,1938 年 6 月 25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可以推测,蒋介石此举目的是借机请德国军事顾问指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布防问题。

③ PAAA,国务秘书办公室,中日战争,第 3 卷,1938 年 6 月 26 日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华(汉口)大使电报。

④ PAAA,国务秘书办公室,中日战争,第 3 卷,1938 年 6 月 25 日魏茨泽克致德国驻日大使馆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放行。7 月 5 日, 德国军事顾问们乘坐一辆由国民政府安排的专列离开汉口, 前往广州转道香港返德。①

结　　语

在国际关系中, 各国均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为其基本目的和行动准则; 国与国之间的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 也主要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因此可以说, 国家利益是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国际关系格局变化莫测的直接动因和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支配着各国的政治与外交行为。

在德国看来, 中德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低水平的战略关系, 不过, 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虽不是很强大, 但不容忽视。德国需要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以防中苏联合, 还需要在同苏联的对抗中利用中国。对德国来说, 如何处理同德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一个战略问题, 而且是一个策略问题。所以,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德国在顾问问题上始终在与日本打擦边球。尽管日本借口防共协定把其侵华行为美化成“为德国在中国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 并宣称这将会给它的防共盟友——德国带来巨大利益②, 期望德国对其侵华战争给予支持, 并要求德国撤回在华顾问、对华实施军火禁运, 国民政府也曾经要求德国利用其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对日本施加影响, 阻止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但德国既没有立即满足日

① 傅宝真:《德籍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及对军事的贡献》, 第 307 页。

② ADAP, D 辑第 1 卷, No. 470, 1937 年 7 月 27 日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电报。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本的要求, 也没有充当中国政府的说客, 而是对中日战争持保留态度。德国与日本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是这并没有最终为两者提供合作的基础。德国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是苏联, 追求的是一组双重目标: 既要防务, 又要缓和。德国并没有因此而面临在中日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 中德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合作, 几乎仍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远东形势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 德国却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既把日本争取为反苏盟友, 也没有失掉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七七事变后, 特别是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 德国对中日争端的态度遂明显转变, 为实现其侵略计划, 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采取"联日政策", 期望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 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联。在日本的外交压力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双重驱使下, 德国政府最终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强行撤走了在华军事顾问。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中德双边关系的单纯意义上的国家行为, 而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不仅是 1930 年代中德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 而且是当时微妙复杂的中德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意义深刻的外交行为, 更是二战前夕险象环生的国际大背景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的国际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决定其政治行为。当时的国际结构则决定了中德日三国的对外政策。就三角关系来说, 主要是看每个国家如何根据于它与其他两国相比所处的地位、怎样对三角压力作出自己独特的反应, 关键是各国的国家力量——综合国力。当时的中国, 虽是一个大国, 但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综合国力上与德日两个帝国主义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 德日两国都把德日关系置于它们同中国的关系之上, 而"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 就必须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似在情理之中。① 也许, 希特勒德国之所以最终撤回在华军事顾问, 是因为预感到中国定将失去这场中日战争。事实证明, 德国为这一赌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陈仁霞, 1965 年生,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　兵)

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1931－1949 年》, 载〔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年)》(下卷)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95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